

戴震《屈原赋注·音义》析疑

徐道彬

戴震《屈原赋注》中《音义》三卷署名为汪梧凤，后之学者不察其究而以之为是。如游国恩《楚辞讲录》^①，褚斌杰校《屈原赋注》的前言^②皆以《音义》三卷为汪梧凤所作。但是，若对跋文做一番推理，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汪梧凤跋文云：

右据戴君注本为《音义》三卷。自乾隆壬申秋，得《屈原赋戴氏注》九卷读之，常置案头，少有所疑，检古文旧籍，详加研核，兼考各本异同，其有阙然不注者，大致文辞旁涉，无关考证。然幼学之士，期在成诵，未喻理要，虽鄙浅肤末，无妨俾按文通晓，乃后语以阙疑之指，用是稍为埤益。又昔人叶韵之谬，陈季立作《屈宋古音义》为之是正，惜陈氏于切韵之学殊疏，未可承用。兹一一考订，积时录之，记在上端，越今九载矣。今就上端抄出，删其繁碎，次成《音义》，体例略拟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也。庚辰仲春歙汪梧凤。^③

此段文字说明，汪氏“自乾隆壬申秋，得《屈原赋戴氏注》”，“庚辰仲春”写成《音义》三卷，其间“越今九载”。本文就此三点结合《音义》与初稿本和刻本的关系，先来进行一些探讨。

戴震《屈原赋注》有两种版本，即《屈原赋注初稿》三卷和《屈原赋注》九卷（《音义》三卷不计）。初稿本成书于乾隆壬申年（1752），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说：“壬申，三十岁。先

生尝语玉裁云：‘其年家中乏食，与面铺相约，日取面为饔飧，闭户成《屈原赋注》。’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。”^④此初稿本现只存《离骚经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三卷，歙县许承尧说：“此为初稿，前无卢抱经序，‘恐美人之迟暮’下亦不引纪晓岚说。正文与刻本异者数十事，刻本多胜。盖先生后据各本校正者也。其中亦有出先生改定者，如《天问》‘焉有虬龙’，此本作‘龙虬’与下协韵。‘环理天下’，此本从江慎修先生说作‘环里’，刻本则皆仍旧文。可见先生著书体例之谨严矣。注文亦互有详略异同，如《离骚经》，刻本作‘离骚’，训‘离’为‘隔’，此本从王逸《章句》，有‘经’字，谓‘离牢一声之转，犹今人言牢骚’。又谓‘经之名起于周末’，‘如音之凡首，织之有经’，不取洪兴祖‘后世尊之为经’之说。他如说兰蕙、说启、说萧钟，二本皆异，且此本驳正旧注，皆直斥其非。刻本则词较简浑，但申己见而已。”^⑤

刻本为乾隆庚辰年（1760）所成，戴震《再与卢侍讲书》（辛巳）云：“去冬刻就《屈原赋注》，属舍弟印送。”^⑥又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云：“庚辰，三十八岁。是冬，《屈原赋注》刻成”。^⑦由此可见，汪氏跋中称“壬申秋”所得之本即初稿本，“庚辰”所成者即刻本，其间为“九载”，按此则无疑义。

但是，汪氏《音义》三卷如果源本之于初稿本，那么这个结论与下文所列事实则进退失据，违戾不合。

《音义》三卷的条目和内容完全采自并配套于刻本而与初稿本不同，甚至抵牾之处甚多。除许承尧叙其所异外，又如初稿本《离骚经》：“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，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。”刻本《离骚》：“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也。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导夫先路也。”《音义》云：“抚壮，俗本作‘不抚壮’。按：王逸云：‘言愿君抚及年德盛壮之时。’又《文选注》云：‘抚，持也。言持盛壮之年。’此汉唐相传旧本无‘不’字之证。”“度也：俗本无‘也’，字”。“路也：与上‘也’字，一为呼，一为应，俗本删去者，非。”又《离

骚经》：“女嬃之蝉媛兮，申申其詈余。”刻本“詈余”作“骂予”。《音义》云：“骂：俗本作‘詈’，非。”再如初稿本《天问》：“昭后成游，南土爱底。”刻本“后”作“王”，“底”作“底”。《音义》云：“底，音旨，作底，非。”又初稿本《云中君》：“羌声色兮娱人，观者憺兮忘归。”刻本“憺”作“澹”。《音义》云：“澹，徒滥切。澹然恬静安缓之意。或作憺，非。”^⑧诸如此类，不俟烦言，由此可见：《音义》三卷为刻本之结果而与初稿本无缘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初稿本与刻本的时间间隔很长，所以在用字、释义、注文思想特色等方面有许多不同，这也是戴震治学思想的一种反映。戴氏著述多精益求精，展转成著，力求“十分之见”。他说：“所谓十分之见，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，合诸道而不留余议，巨细毕究，本末兼察。”^⑨“每憾昔人成书太早，多未定之说。”^⑩戴氏尝云：“余窃谓儒者治经宜自《尔雅》始，取而读之，殚心于兹十年，偶有所记，惧过而旋忘，录之成帙，为题曰《尔雅文字考》若干卷，亦聊以自课而已。若考订得失，折衷前古，于《尔雅》万七百余言，合之群经传记，靡所扞格，姑俟诸异日。”^⑪此论不仅反映了戴氏不轻易以未成熟之著示人，而且此言此语与汪氏跋语正相类，若合一契，不为偶然。

如许承尧所说，《离骚》：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初稿本注：“美人，谓先我而好修者也。”刻本注：“纪编修晓岚曰：‘美人，以谓盛壮之年耳。’”^⑫考纪昀生平，《清史稿·纪昀传》云：“纪昀，乾隆十九年进士，授庶吉士，散馆，授编修。”^⑬按清制，纪昀当在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后才可称以编修。又纪昀《考工记图序》云：“乾隆乙亥（1755）夏，余初识戴君，奇其书。”^⑭由此二证可知，刻本成书当在1757年以后或者说绝不早于1755年，若以汪氏跋中“越今九载”上推，则刻本在乾隆壬申年时就存在，那么与实与理皆相悖。再说，刻本有卢文弨序，卢文弨同纪昀一样也是戴氏入京以后才相识的朋友。这种种矛盾之处都说明：汪梧凤作《音义》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。只有戴震自作而托名汪氏，则

跋文中的“壬申秋”、“庚辰仲春”、“越今九载”三者间的相互关系，才能解释得合情合理而无纰谬。

其次，有人对《音义》中有许多条目是为戴注中的词语和用字作解释而感到疑惑。实不知此乃戴氏为了“幼学之士，期在成诵”而作。因为古文注家之语言多与古文相类，后学之士难通本文，也难解注文，如同今之人视章炳麟古文之语言却比古文更古奥之现象。戴氏为“喻理要”，为自注作注，“稍为裨益”，也可想见如此。再察看《音义》中释注文的内容，比较于戴氏《经雅》、《方言疏证》中与此相关条目就会发现，不论在引证、措词还是语言风格方面，二者如出一辙。例如《音义》注戴注文中“皮傅”云：“《方言》云：‘皮傅，强也。秦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。’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：‘后人皮傅’，《注》云：‘傅音附，谓不深得其情核，皮肤浅近，强相附会也。’”^⑮再看《方言疏证》第七“皮傅”条注：“案：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：‘后人皮傅’，《注》云：‘扬雄《方言》曰：‘秦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。’谓不深得其情核，皮肤浅近，强相傅会也。’后人不达皮傅之意，流俗本多作‘颇傅’者，误也。”^⑯二书注文条目引证、引注皆同，《方言疏证》尤其强调“皮傅”之形体，那么在《音义》中抽出之特为注释，当在情理之中。

《音义》释《屈原赋注·通释》文有：“札，《尔雅》作‘蜚’。良，《尔雅》作‘蜎’。唐，《尔雅》作‘蟪’。‘匭’亦作‘蜎’。郭璞云：‘俗呼胡蝉，江南谓之蟪蛄。’蜎，郭云：‘寒蜎也，似蝉而小，青色。’”^⑰《方言疏证》第十一有：“郭璞注《尔雅》引《夏小正》，‘札’作‘蜚’，‘宁县’作‘虎县’，‘良’作‘蜎’，‘匭’作‘蜎’，‘唐’作‘蟪’。”又引《尔雅》释“蜎”为“寒蜎”及郭注“寒蜎”云：“寒蜎，蜎也，似蝉而小，青色。”^⑱

《音义》释《屈原赋注·通释》之“沈牛”曰：“沈牛，今之水牛。”^⑲戴氏《经雅》二曰：“沉牛，水牛也。”^⑳

从以上引文的内容和形式对比得出的结论不言而喻，无庸赘

言。不但如此，《屈原赋注·音义》的原文中也有此类现象。如《音义》：“维，《淮南·天文训》：‘东北为报德之维也，西南为背阳之维，东南为常羊之维，西北为蹶通之维。’《注》云：‘报，复也’。‘自阴复阳，故曰报德之维。’‘常羊，不进不退之貌。’按：常羊，犹徜徉。”^②再如《音义》：“霸，普伯切。《说文》云：‘月始生霸，然也，承大月二日，承小月三日。’《周书》曰：‘哉生霸。’按：霸，今通用魄。”^③此中“常羊，犹徜徉”，“霸，今通用魄”，一般说来是无需解释的，但戴氏心为“幼学”，不辞烦劳，可谓“坤益”后士。

戴震著述大多由草稿经历多次增删、修改、润色，积时累年而成，现发现戴氏许多手稿上有自己评品自己文章的按语，如《屏山石室记》（代吴希声）、《乐山记》（代吴人云）手稿中戴氏随处泚笔，字里行间探寻文词指意之蕴涵，极有文采，这些批语也是表现其文学成就方面的好材料。清代诸多考证之作，皆是作者数十年积腋聚沙，故随时随处增删是正，为常有之事，在乾嘉考据时代中戴氏此种作法也不足为奇。退一步说，《音义》三卷若为汪梧凤作，视其成就则不下戴氏。然考汪梧凤其人，虽有《松溪文集》传世，而不见其他成就。若有，作为富甲一地之人，当有刻存，但似无发现。许承尧说：“《音义》三卷，段氏谓先生所自为，托名汪君。此本《音义》、《通释》尚未析出，知段说不谬。汪跋殆亦先生自作，检《松溪文集》无之也。”^④

“操觚之士名有隐显之殊。”戴震早年生活拮据，又遭豪族欺凌，故长期寄居于歙县巨富汪梧凤之不疏园，以教书为生，兼与好学之士畅谈学术。城南居士曰：“然成之者实为歙汪梧凤氏，先后礼致二人（按：江永、戴震），斥千金购书，招士之好学者，相与讲贯其中，业成散去，此书为汪氏所刻，流传不多。”^⑤戴震感恩于汪氏，故以托名之作相报。此事在当时说来是很平常的，戴、汪既为好友，也无谓计较，然事实不能不讲。清代许多有志之士，因

于生计，附庸于富豪世宦，以教书、校书、代人著述为谋生之途，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清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写照。像顾广圻、严可均、彭兆荪等为人校书、刻书、写序大多署他人之名，后人知之甚少。而封疆大吏阮元揽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皇清经解》、《经籍纂诂》等巨部于己名下，然其所自为者有几何？戴氏一生潦倒，除最后几年充任四库馆臣外，长期依人檐下，操觚之事难免。察《戴震文集》，代笔之作多见，无烦列举，即便是方志学家公认戴震所修的《汾州府志》也因其署名汾州知府孙和相而遭多事者横议，类此者甚多。胡锦涛《论乾隆〈汾州府志〉》以长篇实证予以批驳，情理俱安，有功于戴氏。顾广圻、戴震等这些寄人篱下的操觚之士用自己的心血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这是时代使然，然而对其个人来说又是多么无私而又无可奈何的事，想来令人潸然。卢弼说：“东原极贫，汪为歙巨族，嫁名于彼刻书以传，或亦意中事。抱经序亦言有为之梓行者，当系指汪氏而言。严铁桥之稿多托名他人，事亦相类。”^②段玉裁也说：“此书《音义》三卷，亦先生所自为，假名汪君。《句股割圜记》以西法为之，注亦先生所自为，假名吴君思孝。皆如左太冲《三都赋注》假名张载、刘逵也。”段玉裁终生服膺戴氏，昕夕相从其学，戴震的言传身教和生平事迹，段氏耳濡目染，期言剴切当理，诚为可信。

综上所述，无论从文字比较还是情理推论都可以说明，《屈原赋注·音义》不是汪梧凤所作，而是戴震自作而托名汪梧凤。本文就此姑妄言之，还望方家教正。

注：

① 《游国恩学术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1月版。

②③②⑥戴震《屈原赋注》，褚斌杰等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12月版。

④⑥⑦⑧⑫⑭⑮⑯⑰⑱⑲⑳ 《戴震全书》，黄山书社，1994年9月版。

（下转第284页）

残卷有八号《刘子》矣。移录如下：

……**风****于**广泽恣情所
……**非**远于广泽被发之童
……**而**近不及远强不及弱者
……**聩**天下之工击剑者
……必刎其指而弗能
……若提其觚而掉其
……截蛟龙矣顺
……**执**剑锋欲

作者工作单位：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

（上接第 211 页）

⑤⑪⑲⑳㉑㉒《戴震全集·屈原赋注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6月版。

⑨《与姚孝廉姬传书》，同④。

⑩㉑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同④。

⑪《尔雅文字考序》，同④。

⑬《清史稿·纪昀传》，赵尔巽等撰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版。

㉒《屈原赋注·城南居士后记》，同③。

㉓胡锦涛《乾隆〈汾州府志〉》，《文献》，1996年第3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古籍所